

[文章编号] 1005 - 1597 (2011) 01 - 0003 - 12

建党初期毛泽东的几篇文稿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九二三年七月)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饮水思源，创业维艰。本刊特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和 1922 年至 1923 年出版的报刊《东方杂志》、《大公报》、《前锋》和《向导》中，选取毛泽东 1921 年到 1923 年间的七篇文稿。其中三封书信为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当年起草、撰写的四篇文稿亦难得一见。从这些文稿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关注、调研与思考，以及投身革命、参与社会实践的忙碌身影。为保持文献原貌，所刊文稿，除明显的错字、漏字分别在 < > 和 [] 号内校正，或加注说明，衍字用 [] 号表示之外，其他均照原样，未作改动。原文为竖排繁体的，现改为横排简体。原文没有标点符号的，加了标点符号。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一九二一年八月)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那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办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就不少。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总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佔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还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确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讳，也无从隐讳。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

* 据时任湖南自修大学事务主任的易礼容 1987 年 6 月 7 日回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和《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两个文件都是毛泽东执笔写的。”

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以上是说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现在再说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是二。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是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既如上说，那么自修大学的内容怎么样呢？现在说一点大略于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么？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澧江流域的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方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使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势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根据 1923 年 3 月 25 日《东方杂志》第 20 卷第 6 号刊印



致张秋人信 *

(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

秋人⁽¹⁾兄：

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一号，请你快将第二号补来。细则⁽²⁾收到了。先报⁽³⁾第八期亦到。此间改组事⁽⁴⁾，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 S.Y⁽⁵⁾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⁶⁾，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树⁽⁷⁾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⁸⁾，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至要至要！盼复。

前给你几信均未见复，何故？

弟子任。

六月七号。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 秋人，即张秋人。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同年秋，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被推荐到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员，指导党团工作。

[2] 细则，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细则。

[3] 先报，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先驱》。该刊于1922年1月15日创办，次年8月15日停刊，共出2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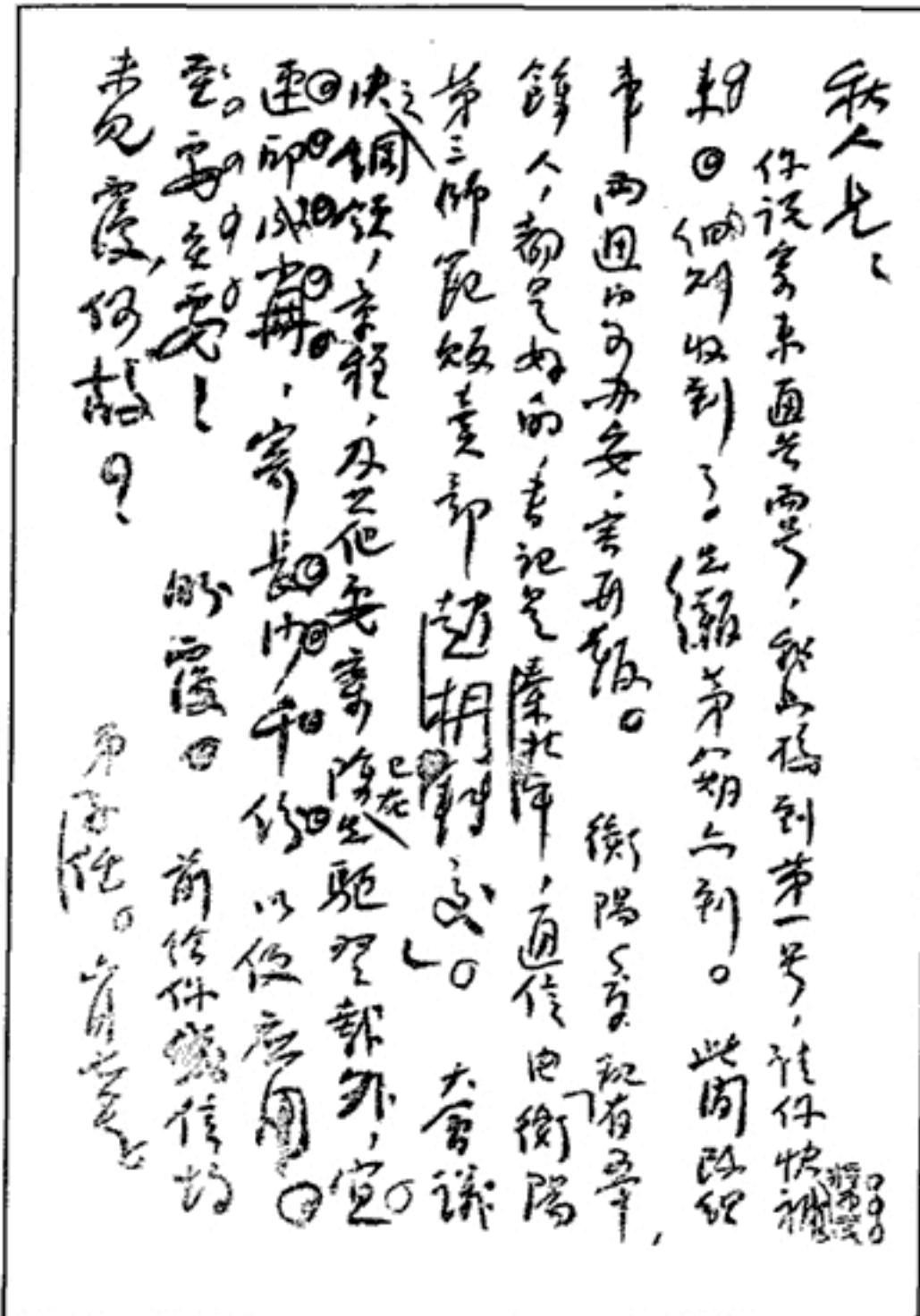
[4] 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改组。

[5] 衡阳 S.Y 即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2年5月1日。S.Y 是英文 Socialist Youth League 的缩写。

[6] 秦北平，黄和钧的化名，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语文教员。

[7] 赵树，当时任衡阳地方团劳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第三师范新书报刊贩卖部负责人。

[8] 指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章程。



毛泽东致张秋人信手迹

* 据《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罗宗翰给周世钊信》后的编者按称：“子任即毛润之”。又《先驱》第8期于1922年5月15日出版，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于1922年6月17日改组，故此信当写于1922年。

致张秋人信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秋人兄：

常德 S.Y 已经成立^[1]，书记蒋希清^[2]，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衡阳 S.Y 负责人现为第三师范赵树，请注意。

前信请即复。

弟子任。

六月十五。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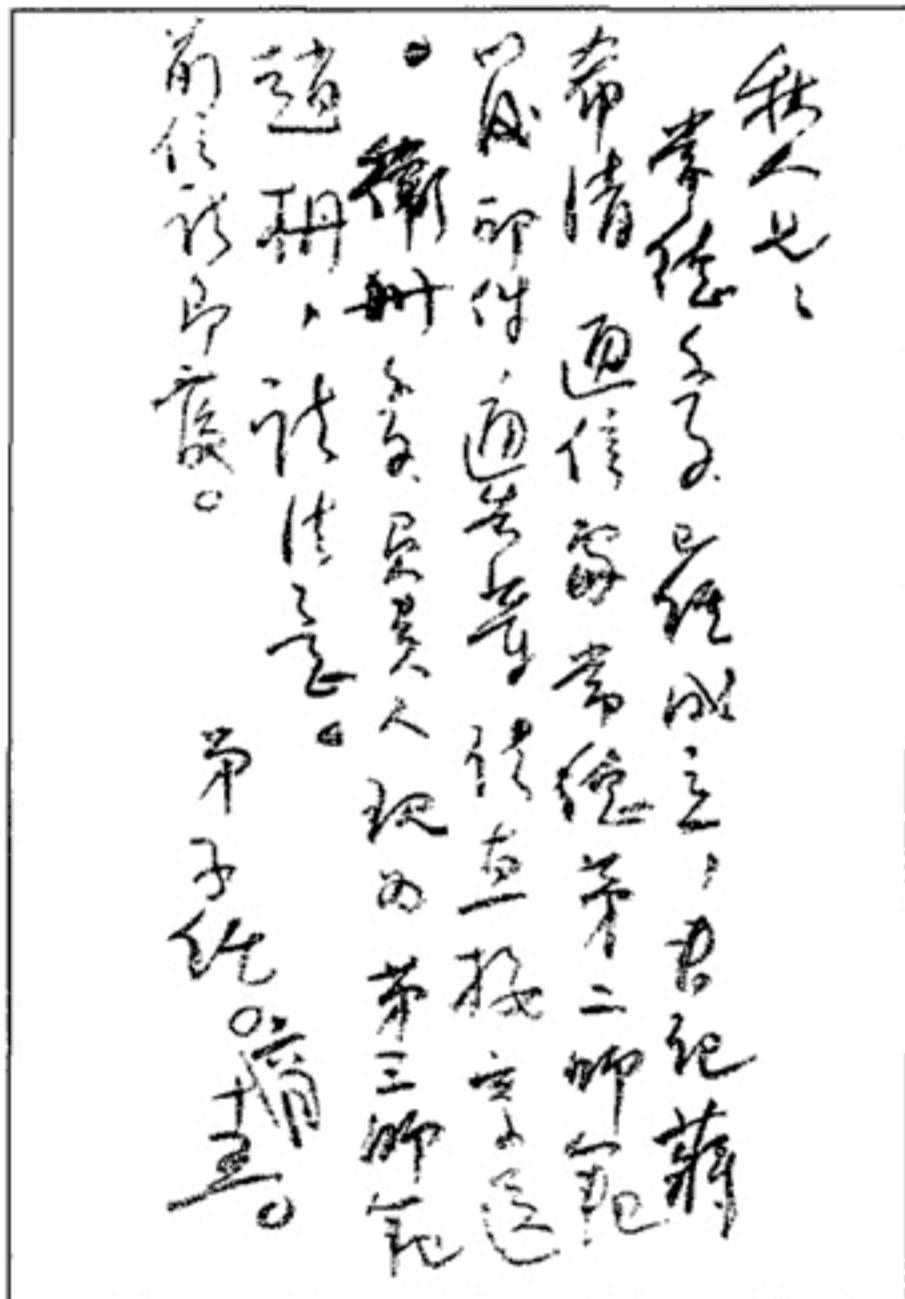
[1] 常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2年6月12日。

[2] 蒋希清，1922年6月至9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呈为营业自由恳请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事。窃工等要求将工价增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1]，迫而罢工已二十日。昨日工等全体齐赴长沙县署，据省宪法第十七条^[2]陈诉疾苦，请其取消前发布告，以全生活。正争持间，适接省长电令，允在今日完满解决。窃思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等工价之争，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宜双方自行协定，非有强迫行为，官署不必过问。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来〕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隆情盛意，至为感激。现工等全体集合省教育会前坪，群情一致，恳求省长即赐解决，以安人心。所有工等工价增加，属于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官署不必过问缘由，理合呈请省长，即时明白批示，交由代表携回。并请令饬长沙县周



毛泽东致张秋人信手迹

* 1922年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6000余人为增加工资和争取营业自由而罢工。毛泽东领导泥木工人代表与长沙县知事周瀛干，湖南省政务厅长吴景鸿、省长赵恒惕进行谈判，并取得胜利。据当时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沙泥木工人谈判代表之一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毛泽东最清楚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全过程，呈文是他起草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毛泽东为工人起草了致省长的请愿呈文，并亲自充任谈判代表与官府谈判。”

知事废弃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实为公便。谨呈湖南省长赵。湖南省城泥木工人任树德 仇寿松 杜仲堃 黄少梅 李海珊 毛润之 朱有富 罗子佩等六千四百余人全体谨呈。

根据 1922 年 10 月 25 日湖南《大公报》刊印

注释

[1] 1922 年农历 8 月 14 日（公历 10 月 5 日），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布告，限定泥木工人工资照 1920 年铜钱价折算，甲工每日银元二角七分，乙工二角一分。

[2] 1922 年 1 月 1 日公布的《湖南省宪法》第二章第十七条是“人民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

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信 *

（一九二三年三月七日）

光亮^[1]兄：

廿四号来信收到。全国大考^[2]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3]议决照办。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4]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

文化要劳动史^[5]四百本，请速照发。

弟 子任。

三月七号。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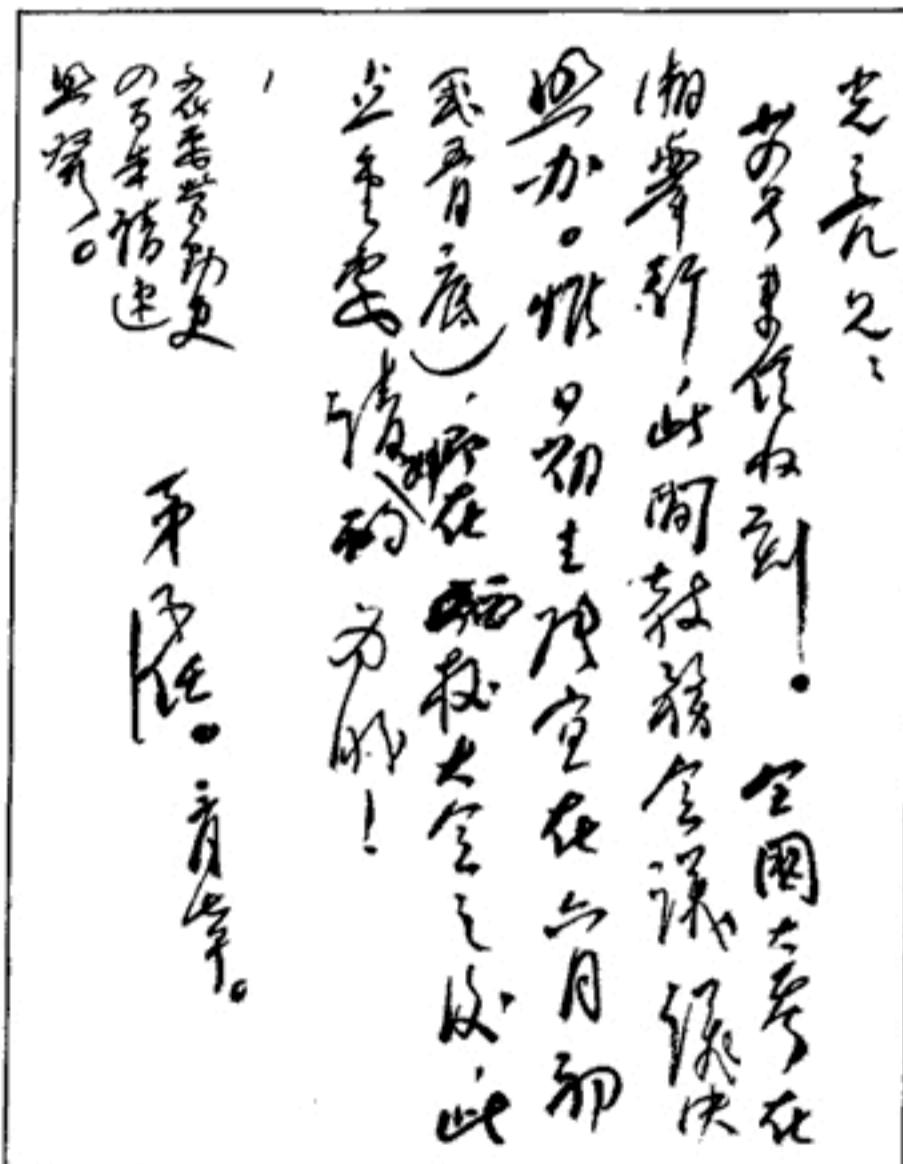
[1] 光亮，即施存统，1922 年 5 月至 1923 年 8 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2] “全国大考”是代号，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该会原计划在湖南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时局恶化，改于 1923 年 8 月在南京举行。

[3] “教务会议”是代号，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议。

[4] “西校大会”是代号，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 文化，指长沙文化书社。劳动史，指施存统编著的《劳动运动史》，该书于 1922 年 4 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行。



毛泽东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信手迹

* 信中提到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建议该大会放在中共三大以后召开，据此该信当写于 1923 年。



省宪下之湖南*

(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

省宪下的湖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湖南人恐怕知道的很少。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新近发生的劳动运动，若说详细，不是一篇短文可了，简括地叙述大略如左。

(甲) 政治

(一) 省宪 省宪之议自湖南始，至今也只有湖南有省宪，这原因是很寻常的。湖南介于南北之中，经汤乡〈芗〉铭，傅良佐，张敬尧^[1]三次北洋派武力的蹂躏，人民恨北派武力至深。及谭赵湘军驱逐张敬尧，适值北方直皖两派开始分裂之时，乃有省自治省宪法之议，这完全是北洋武力的反响。湖南若无省宪为护符，则容易遭兵，在人民不愿，在军阀更不愿，结果成为军阀利用民意借省宪以自保全，故省宪仅为在湖南这不利的地势上一个弱小的军阀（赵恒惕）用来保险的工具。兼有几省强大的军阀如吴佩孚固然不要省宪，张作霖也只要自治不要省宪，即力量弱小但因地形僻处不甚怕别人侵略，有时还想就军饷于邻省的军阀如唐继尧^[2]也不要省宪。故省宪只在湖南这个地方有出现的可能。然也万难长命，因省宪虽以时机的关系得侥幸御外患于一时，但终究是束缚军阀的绳索。如湖南省宪规定军费缩小至岁出三分之一，现在预算不能照省宪规定已有不能不撕破省宪之势；加以谭派与赵派相争，事实上一定要迫令一派勾引外兵争此位盘：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联省自治更是万无实现之望的东西。

(二) 政派 谭延闿〈闿〉，赵恒惕，林支宇^[3]分为三派。谭派的民康社，赵派的民新社，林派的湘社为他们的政党。林派在军事上无势力，仅有一组卑污政客为牟利的目的而结合，伺谭赵两派的盛衰以为趋避，三派中最为下品。赵派现在当权，其政治生命实际上建设在南北相持中吴佩孚的威劫和恩养上面（省宪也建设在这个上面），故虽军事势力不及谭派而能持久不倒。谭派失势已三年，然在军事上尚有大部分势力，近来投入国民党，欲仗孙中山援助恢复政权，和赵派争斗异常剧烈。此外政学系^[4]则依附赵派以谋福利。

(三) 政府 本年一月依省宪产生的新政府，分内务，交涉，财政，实业，教育，司法，军务七司，七司司长统于省务院长，俨然责任内阁，省长则一虚摄的总统。省长赵恒惕，省务院长李剑农，内务司长吴景鸿，交涉司长杨宣诚，财政司长袁华选，实业司长唐承绪，教育司长李剑农，司法司长徐钟冲〈衡〉，军务司长李右文。这就是政府的组织。

(四) 议会 政府由议会选举，故议会颇有力，议员的来源完全由金钱买卖。其类别官僚一部分，滥绅一部分，政客一部分。其党籍三分二属赵派，三分一属谭派及林派。这次湖南新省议会，充分表显了贪鄙、专横及愚蠢，舆论恨他们次骨。

(五) 军队 现有军队二师五旅。其组织及分布大略如下：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第一旅旅长贺

* 1920 年 6 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以“湘省自治”、“湘人治湘”为旗帜，反对外来军阀统治湖南。7 月 22 日谭发出“祃电”，宣布废除督军制，实行“地方自治”、“民选省长”。11 月 23 日谭去职，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12 月 11 日成立“制宪”筹备处，并起草“宪法草案”。1921 年 4 月 21 日公布《湖南省宪法草案》。1922 年元旦颁布《湖南省宪法》。9 月 10 日，赵猎取了“民选省长”。他以“省自治”、“省宪法”为护符，统治湖南五年零四个月。1926 年 3 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职。本文署名石山，系毛泽东的化名。1923 年 9 月 28 日，毛泽东在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曾说：“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耀祖，团长郑鸿海谢煜焘，驻常德及益阳。第二旅旅长唐生智，团长刘兴李品何（仙），驻常德。骑兵团何健（键），驻桃源。炮兵团黄辉祖，驻常德。又汪磊一团亦属第一师，驻郴州。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第三旅旅长刘碉，团长叶琪袁植，驻南县及湘潭。第四旅旅长唐荣阳，团长唐生明唐振铎，驻澧县及石门。骑兵团唐希忭，驻湘潭。炮兵团戴岳，驻长沙。第一混成旅长旅〔旅长〕叶开鑫，团长蒋锄欧刘重威邹鹏振朱耀华，驻长沙醴陵湘阴一带。炮兵营尹甫龄，驻长沙。衡阳镇守使兼混成旅长谢国光，团长谭道源成光耀刘雪干，驻衡阳桂阳永州三县。宝庆镇守使兼混成旅长吴剑学，团长吴家铨张湘砥，驻宝庆及武冈。沅陵镇守使兼第九旅第十旅旅长蔡巨猷。第九旅旅长刘叙彝，团长何隆干谭润生，驻湘西之黔阳洪江。第十旅旅长田镇藩，团长彭寿恒杨毓棻，驻湘西之辰州及黔阳。此外尚有陈渠珍所部驻湘西，保靖乾县镇筸（筸）绥静（靖）各处之巡防营十余营，夏斗寅所部驻浏阳之鄂军一团，王得庆所部驻永州之宪兵一营。总计湘军人数共约四万。内贺耀祖唐生智叶开鑫三旅属赵恒惕派，叶开鑫之混成旅数近一师，号称赵派的主干。鄂军夏斗寅一团中立。其余均属谭延闿派，湖南因系瘠省，又无兵工厂，所以不能多养兵。兵不甚多，则军饷虽不足，而尚可勉支一时，不至发生重大事变，与四川云南等省养兵过多有时不得不向外就食者稍不同，故湖南只要别人不来侵略，自己亦无须侵略别人，所谓门罗主义的省自治，其内的经济的方面，乃建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得保有二三年生命，以至于今。

（六）财政 湖南岁入共千四百万元（国家地方均在内），截留应解中央之国家税为省用，此亦省自治之一个经济的动因。依省宪规定军费占三分之一，教育费占三分之一，行政占三分之一，这是新预算，尚未实行，也万不能实行。财政系统紊乱已极，政府直接收入只有省城一点税捐，及榷运局造币厂二三机关的收入以度日，外县从田赋以至一切正杂税捐，大部分均被军人就地截用，故财政不能整理。军费，以至行政费，教育费，以前积欠甚多，无法清偿。旧债不清，更无整理办法。赵政府谋借外债，又被谭延闿派多方破坏，数次无成。湖南业已四年无事，这四年中以全省之财力，养尚非巨额之军队，济之以军队私抽之鸦片烟税，故能勉强相安无事。今则承平稍久，军队之欠饷暂多，搜括已穷，借债又无着，而军队一人不能裁，赵政府之财政基础现在已很薄弱，倘谭派乘虚进击，赵非变到投降吴佩孚，则必须倾倒无疑。

（乙）经济

（一）工业 湖南境内全部在手工业时代，除省有第一纱厂及官营水口山铅矿，商营锡矿山（新化）铅矿外，无他较大的产业可指，商营小矿颇不少，小规模炼铅炼锑厂设立颇多，但资本极小，欧战后铅锑砂价又贱，故营业甚不振。第一纱厂系官有资本二百万元，租商开办，营业活动资本不及二十万；但营业情形尚好，股票价每百元值百十五元。湖南光华两电灯公司在省城营电灯业，两公司竞争颇烈，但营业均不振（湖南较光华为好），股票跌至六十元或四十元。造币厂官办以铸轻质当二十铜元^[5]，采取其余利为目的，月铸二百一十万串，可获利十五六万元。铜元价在市面每二百一十枚当银一元，害民极大，除水口山有外人小规模炼砂厂外，湘省无外人经营之业。

（二）商业 全体为小资产商业，以长沙湘潭常德为三个大埠。外商以英商营业较大，日商次之，美德又次之。四国在长沙均设有领事。

（三）农业 湖南山地多平原少，除洞庭沿岸略有较大规模经营之农业外，余均小资产当自耕农及佃农。佃农生活比雇工还苦，因雇工必家累少生活简，佃农则必人口甚多之家，纳租于田东，普通东佃各半，重者东七佃三，最重东八佃二。故佃农如单靠田里收获断不够生活，全靠喂猪、种杂粮等副业为之补足。湖南前数年连遭兵祸，荒欠不少，近二三年稍稍复业。全省米产除沿湖下游一带年有一部分输出省外外，余均仅足自给，故“湖南熟天下足”的话现在并非事实。每年冬初开岳州关，春初闭关，政府利有每石一元之米捐作财政之补助。

(丙) 一般文化及教育

(一) 一般文化 小农民思想略无变动，他们政治的要求但求有清官有好皇帝。女子尚有十分之三四是小脚，惟男子辫发即僻地亦没有了。教育上大致已采用新学制，惟办学人物依旧，根本上并未有大变。最好的代表是省议会议员，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新政治制度，而言论动作，充分表现宗法社会之一切旧式样，丝毫没有变动。耶稣教天主教教堂布满全省，僻地小镇无不侵入。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空气。省城有日报九家，只有大公报销数有二千三四百份。其余自一百份至五百份，内容多不成样子。

(二) 教育 所谓教育就是指学校，湖南办学的人派别最多，略纪于下：

大农派

前清高等学堂求实书院求忠书院三校出身之合体，因西洋留学归国者多，又名西洋派。以教育司长李剑农为领袖，党徒之思想大半顽固，以大农学校为本营，散布教育界颇广。

优级派

优级师范出身。思想腐旧。在教育界颇得势。

高师派

本省高等师范出身，思想较新颖。

北高派

北京高等师范出身。思想在诸派中为最新颖。青年教育社为其集合体。

高工派

前清高等工校及现在工业专门出身，盘踞工校，议会政府均有其势力，最为顽劣。

城南派

清城南书院中路师范出身。思想腐旧与优级派等。盘踞教育会。

平大派

研究系及创造社人物易家铖罗敦伟张资平等组织平民大学，俨然一小派。思想在各派中算最杰出。

一师派

第一师范出身。其势力在小学教育。思想顽固新颖各半。

东洋派

日本留学生。以甲种工业学校为根据。顽劣与高工等。

君子派

此派以陈佩霖^[6]，朱剑凡，胡子靖，彭国钧等为代表。最早的日本短期师范出身，以楚怡，明德，修业，周南四校为根据。思想顽固而颇有正气，故素有君子之称。

诸派中优级为老前辈，大农人物虽老而结合则新，两派在教育界目前要称两霸。高师与优级本为弟兄行，却因地盘之分配，反脸特甚。高工，东洋近颇失势，然其潜力仍不弱。城南则鼠窃狗偷，依附赵恒惕以为活。君子一派从前清末年以迄民国八年，号称教育界之专卖，最为煊赫，民九以后各派崛起，其势稍衰了。北高，平大，一师三派号为新派，颇有结合联立战线以御旧派之势。湖南私校多于公校，各派亦多以私校为母国而以公校为殖民地。教育经费连留学经费在内数近二百万，私校例得受津贴，津贴多者至万余，少亦数千数百，是为私校发达的原因。

(丁) 劳动运动

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今将各种工团及罢工统计。列表如左。

(一) 新式组织的工团

名称	组织年月	人数	工会所在地	备 考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去年五月	11000	萍乡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 ^[7]	去年十月	3000	水口山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粤汉铁路总工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工会合组
粤汉路岳州工会 ^[8]	去年五月	300	岳州	
粤汉路长沙工会 ^[9]	去年八月	600	长沙	
造币厂工人俱乐部	今年一月	1500	长沙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第一纱厂职工俱乐部	今年三月	1500	长沙	因与职员合组组织不甚完备但颇有力量
泥木工会	去年九月	2000	长沙	力量较弱
缝纫工会	去年九月	15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力量亦弱与店主争执尚未解决
铅印活版工会	去年十月	350	长沙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石印工会	去年十月	3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无多力量
电汽工人俱乐部	今年二月	100	长沙	组织尚未完备
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	今年二月	300	长沙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人力车工会	去年十月	1850	长沙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机械工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与湖南机械【工】会对抗而设
理发工会	去年十月	500	长沙	与店主抗争两年颇有精神
笔业工会	去年十月	300	长沙	力弱
靴鞋技师工会	去年十一月	2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力弱
碾谷工会	今年四月	500	长沙	遭官厅解散
茶居工会	今年二月	3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无甚力量
砂船工会	今年一月	200	水口山	与水口山矿工俱乐部连结颇具力量
铜官陶业工会	今年二月 ^[10]	3000	铜官	铜官为湘省瓦器窑业大埠工会颇具力量

以上二十三工团总计人数约三万人

(二) 旧式组织的工团

劳工会	有两个，一即为赵恒惕解散之劳工会，现设办事处于上海；一为第一纱厂资本主组织之劳工会，目的欲取旧劳工会而代之。
机械会	一班工业专门学生裹挟少数工人艺徒所组织，宾步程领袖
工业总会	省城手工业店主之团体，政府所承认为法团者
中华工会	流氓陈家鼐所组织，设总会于省城，设分会于各县
工人同志会	造币厂宾步程派一部分工人为对抗造币厂工人俱乐部而设

以上五个工团，除工人同志会确有四百余人，机械会有二三百人外，劳工会，工业总会，中华工会完全是空体，并无工人。旧劳工会在未封前有二三千人，因系各业糅合的旧法组织，故一被封便都散去了。

（三）罢工统计

罢工者及次数	加入人数	罢工要求	罢工日期	胜 败
安源矿山及株萍铁路一次	11000	集会结社自由加工资	五天	全胜利
粤汉铁路二次	800	第一〔次〕加工资，驱张苗， 第二次援助京汉	第一次十九天， 第二次一天	第一次大部胜利， 第二次失败
长沙泥木工一次	4000	加工资	廿四天	全胜利
水口山矿工一次	3000	加工资	廿三天	全胜利
长沙印刷工一次	350	加工资	十七天	全胜利
长沙缝纫工一次	800	加工资	十天	小胜利
长沙织造工一次	1500	加工资	廿天	半胜利
长沙理发工一次	500	集会结社自由，加工资， 与店主平分公产	廿天	大部胜利
长沙笔业工一次	300	加工资	三十五天	半胜利

共计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罢工人数共计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人。罢工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自由。罢工时期均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

根据 1923 年 7 月 1 日《前锋》第 1 期刊印

注 释

[1] 汤芗铭，1913 年 10 月奉袁世凯令率领北洋海军赴湘镇压讨袁军。夺湘后，任湖南都督。1916 年 7 月被湘军驱逐出湖南。傅良佐，湖南乾州（今吉首）人。1917 年 8 月由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同年 11 月被湘桂粤联军驱逐出湘。张敬尧，1918 年 3 月由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1920 年 6 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逼迫下，在湖南人民反对声中离湘。

[2] 唐继尧，滇系军阀首领，当时任云南省省长。

[3] 谭延闿，辛亥革命后任湖南参议院院长。在军阀混战中，曾三度出任湖南都督、督军兼省长。1922 年投奔孙中山，历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建设部长、大本营秘书长等职。林支宇，1920 年 6 月至 1921 年 4 月任湖南省务处处长、临时省长、省议会议长等职。

[4] 政学系，其前身是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成为袁世凯统治时期国会中的一个派系，称政学系，首脑人物是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个集团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后来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系之一。

[5] 铸轻质当二十铜元，即铸造量轻质劣的铜元。每枚铜元相当制钱二十文。这是湖南造币厂在 1920 年前后铸造的货币。

[6] 疑为陈润霖之误。

[7] 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应称水口山铅锌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时间应为 1922 年 11 月。

[8] 粤汉路岳州工会，应称粤汉铁路岳州工人俱乐部，成立时间应为 1922 年 8 月。

[9] 粤汉路长沙工会，应称粤汉铁路新河工人俱乐部，成立时间应为 1922 年 5 月。

[10] 铜官陶业工会成立时间应为 1923 年元月。

北京政变^[1]与商人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2]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上海总商会^[3]复于六月廿三日经会员大会议决，发表对全国国民的宣言，这个宣言里说：

“用敢掬诚宣告中外，自本月十四日起，所有曹锟高凌蔚〈鬻〉^[4]等因僭窃政权对内对外种种行为，凡我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除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请各自维持其境内之治安以维现状外，其善后建设事宜，谨当与全国国民共谋解决。”

总商会同时议决否认“不能代表民意”的国会，并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以为积极解决国事的机关。上海各马路商联会和上海总商会这次举动，总算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大家知道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商人之迫切要求裁厘加税，是他们利害切肤的表示；但裁厘加税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因为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假使把厘金通通裁掉了，结果是军阀一天一天瘦而商人一天一天肥，那时商人起来推翻军阀真是只要“一声喊”，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聪明的军阀决不做这样蠢事；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5]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了，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发展，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狡猾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更决不做这样蠢事。所以裁厘加税，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简直是有生死关系，断不是黎元洪一纸稽滑的起身炮命令^[6]所能做到的。我们再看最近上海纱商要求国家发纱业公债为曹锐靳云鹏破坏^[7]，要求国家禁棉出口又为外国公使团破坏，更足证明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这些都是上月二十三日到了上海总商会会员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斋^[8]先生们亲自尝到的苦味！

商人们历来“酷爱和平”，未想到政治的改造需要革命，不是几个“裁兵制宪理财”的电报所能收效；更未想到革命须要自己出马，号召组织全国国民，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革命的实力；甚至以为改造政治不必需要一个政党，而怪国民党之努力革命为多事；商人们从前这些幼稚而且怯懦的心理，试将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岂不要哑然失笑？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近来美国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我们从这次上海商人对于政变的举动看来，知道他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至其对于美国阴谋侵略中国的愤恨，我们从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反对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

“乘我国民于民治运动奋斗期中，高唱隐含共管中国的论调，而以中国商会及银行界已〈已〉予同意之谬说，建议本国政府”的文电看来，“中国商人媚外”的恶名，至少也洗去了一部分。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上海以外的商人都一齐起来一致行动。现在的时机是火烧眉毛尖一样的迫切，再不容我们躲懒睡觉；现在是要团结全国国民实行做革命运动，更不容于商人之中还分出派别。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我们帝〈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汉口的商人不为吴佩孚所劫持，一齐起来和上海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末了，我们还有须警告全国商人的：第一，革命的大业〔不〕⁽⁹⁾是容易的事，在向来外力军阀两重压迫革命的中国环境里更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要实践总商会“与全国国民解决”的宣言，不要再蹈从前商教联合会拒绝工人加入的覆辙。第二，现在商人们既已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就要赶快去踏上第二步，坚持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¹⁰⁾的办法，整严步法，努力向前，不达目的不正〈止〉；切不可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路上去。大家要相言〈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根据 1923 年 7 月 11 日《向导》第 1 集第 31、32 期合刊刊印

注 释

〔1〕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曹锟唆使高凌霨、吴景濂等政客策动军警索饷，警察罢工，张绍曾内阁总辞职，逼迫大总统黎元洪离京赴津。14日，黎元洪通电辞职。同日，国务院内务部长高凌霨宣告摄行大总统职权。这就是“北京政变”。

〔2〕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是上海中、小资本家的组织。

〔3〕上海总商会会员以民族工商业者占多数，但领导权掌握在大资产阶级手中。

〔4〕高凌霨，1923年参与直系驱逐总统黎元洪出京，一度摄行总统职务，并以内务总长代内阁总理。

〔5〕协定关税，又称协定税率，是一国根据与他国缔结的条约或贸易协定，对进出口商品所规定的税率。1843年中英《海关税则》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税率为值百抽五。

〔6〕指1923年6月13日大总统黎元洪发布的命令：一、免去国务总理张绍曾职，由李根源继任；二、裁撤各省巡阅使、陆军检阅史、督军，军队归陆军部指挥；三、自1924年起裁废全国厘金；四、讨伐毁法乱政，发纵指使之人。命令发布后，随即离京赴津，14日即通电辞职，人们谓黎的13日命令为“起身炮命令”。

〔7〕曹锐，曹锟之弟，直系军阀保定派头目之一，直隶省（今河北）省长。靳云鹏，山东邹县人，曾两次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后在山东经营商业。1923年曹、靳曾唆使天津纱业团体反对上海纱商要求国家发行纱业公债的提议。

〔8〕穆藕斋，疑为穆藕初，或其兄穆恕。

〔9〕此处原件脱漏，从上下文看，似为“不”字。

〔10〕1923年6月14日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7月，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随后，这个主张逐步为全国各界人士所接受，发展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运动。